

忆王重民先生

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杜伟生

在我的学习生活中有件值得庆幸的事，就是王重民先生曾经作过我的老师。而非常不幸的是，王老师是在我们这个班结束他的执教生涯的。

1974年10月，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开办了“古籍整理进修班”刚到北京图书馆工作才满半年的我，被选送到这个班学习。作为一名学生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学习，一直是我整个中学时代的梦想，能在参加工作以后实现这个愿望，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当时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是郑如斯老师，专业课由王重民先生和一位北大图书馆资深馆员担任，当时王重民先生已经是71岁高龄了。

一件大衣

那一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。虽然刚到10月，大家都穿上了冬装。先生总是穿着一件一看就知道穿了多年、但还是非常整洁的狐皮短大衣，即使在教室里，这件大衣轻易不脱。开始我以为先生年纪大了，身体可能不太好，怕冷。但听到系里某些“革命同志”对他既不称呼“先生”，也不称呼“老师”和“同志”，而是叫他“王教员”的时候，不禁觉得心里一阵阵的发冷，这时才体会到先生周围浓浓的寒意。

一个习惯

先生的衣服口袋里，总是有几张卡片，一支铅笔。遇到想记下来的事，就马上掏出卡片和铅笔，记录下来。我以前听魏隐儒先生说，当年在北京琉璃厂有个孙殿起老先生，他的衣服兜里总有几张小纸片，一支铅笔头。他只要是遇到以前没有见过的书籍，就马上记在一张卡片大小的小纸片上，以后他把这些小纸片集中起来，就成了一部《贩书偶记》。而在北京大学、在国家最高学府里，在著名教授的身上，我亲眼见到了这种良好的治学习习惯。我曾经问过先生，为什么把东西记在纸片上而不是记在笔记本上。先生告诉我，记在纸上非常方便。因为同一条记录，可能要用在几个不同的题目下面。记在纸上可以随时根据需要随便组合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而记在笔记本上就不一样了，一般人都舍不得把本拆开成散叶，就是舍得，因为两面写字也不好写，远不如纸片方便。我曾经见过先生积攒的卡片，摞起来比人还高。想必先生当年撰写的那些宏篇巨著，都是这些卡片积累起来的。先生的习惯也影响了我，现在遇到什么问题，也马上记在卡片上备查。20多年来，深感到这种资料积累的方法方便和实用。

一堂课

先生知识渊博，平易近人。刚进学校，我对图书馆业务工作都不了解，对古籍的分类和编目工作更是一窍不通，是基础最差一个。所以，我的问题总是比别人的多。而在上课的时候，先生对我也非常的注意，每次上完课，总要问我听懂没有。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国书馆学专家，但每次上课前都认真备课。先生讲的一次目录学史的课，留给我的印象最深，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次课。

那次讲课，讲的是目录史。像其他老师一样，先生把讲课的重点用板书写在黑板上。但这些板书的位置和其他老师大不一样。没有我们常见的大一、二、三；小1、2、3，也没有反复的擦了写，写了擦，而是东写一点，西写一点。先生写在黑板上的字从上课开始一直到下课，没有擦、改一个字，只是快下课总结课上讲的内容的时候，按照分类的差异将黑板上的内容分别用线条连在一起，这时我才感到先生高超的授课艺术。整堂课先生没有一句多余的话，整个黑板上没有一个多余的字。黑板上每一个字的位置似乎都是精心安排的，经过连线，所有授课内容都分门别类的清楚的展现在同学们的面前，即使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古籍的我，这时心里也非常清楚课上讲的所有内容。

一种书

在那段时间里，直接进行古籍研究是不行的。研究古籍要有一个符合当时政治形势的名目才行。当时我们的任务是研究“法家”、编制有关“法家”书目。记得有一天早上，有个单位派人给我们送来一种名为《荀子》的书，叫我们给鉴定一下版本。

这种书中没有记载任何书籍的出版信息，同学们都拿不准书籍出版的年代。书在同学们的手中转了一圈，最后交到先生手中。从先生的眼神中，大家都看得出先生已经判断出书籍的版本，但先生却没有明说，只是说还要仔细的看一看再说。

当天下午，我们有事去先生家，看到先生家的地板上摆满了各种版本的《荀子》，先生跪在地板上，正拿着我们交给他的那种《荀子》，一种书、一种书的在比对。一边比对，一边做着记录。经过2个多小时的工作，才告诉我们这种《荀子》的版本情况。

事后有同学问先生，判断这种书的版本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事。先生语重心长的说，判断一种书的版本时代其实并不难，难的是弄清楚这种书的版本系统，如果再把流传的情况搞清楚，才算是完成对这种书的认识。先生的话虽然不多，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还能告诉我们这些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。

一句话

我曾经问过先生，什么是版本学。先生没有用课本上版本学的定义回答我，而是简单的说，版本学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一句话：“就是比对之学”。关于这句话，先生解释说，版本

这东西，只要你见的多了，自然就记住了。就像张三、李四，只要你经常见到他们，就记住了他们的容貌。时间长了，即使他换了衣服装束，你一样能够认出他们。遇到有的书以前没有见过，并不新鲜。中国的人这么多，你不可能都认识。中国的古书这么多，你也不可能都见过。没见过不要紧，只要拿来和其他本子比对一下，看看它们之间哪些方面一样，哪些方面不一样，版本情况就清楚了，你也就记住了。

这句话说的是先生的经验，同时，这句话也道出了版本学的精髓。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，20多年过去了，直到今天这句话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什么是版本学，我就会告诉他，版本学简单的很，就是“比对之学”。

一张工作证

先生外表儒雅，待人宽厚，特别喜欢小孩，对同事的小孩照顾有加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先生宽厚待人的结果，却招来了非议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这很快就被当成“腐蚀拉拢革命干部”的典型，很快，先生就成了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施暴的对象。

1975年4月中旬，我们突然接到通知，全班到师范学院图书馆学习。几天以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先生已经在4月15日就离开了我们。临走的时候，他随身只带了一张证明自己身份的工作证。

先生走了，走得是那么突然，留给我们的的是无尽的哀伤。

我们当时非常不解：“文化革命”已经10年了，加上以前的历次“运动”，先生也算是经历过不少，都能坚持下来，为什么这一次就没有熬过去呢？

事后再想，以前先生所受的“冲击”，大多是在政治和学术方面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大可以蔑视这些，以一个平常的心态，泰然处之。而这一次，在“四人帮”极其爪牙灭亡前垂死挣扎之际，疯狂践踏先生的尊严，侮辱先生的人格。“士可杀不可侮”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作为一介文弱书生，先生除了以死抗争，以自己无言的抗争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之外，还能做什么呢？

我们为先生不平。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，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贡献很大，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。如果当时的政治环境好一点的话，先生肯定能够有更大的作为。但在当时，这无疑是一种奢望。

我们为先生惋惜。先生走后才仅一年多的时间，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就彻底覆灭，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。我们在欢喜之余，不禁万分的惋惜：先生若能看到这一天，肯定会非常的欣慰。如果能够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时代，先生肯定……。

今年是先生诞辰100周年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们更加怀念先生。先生，你知道你还在我们的身边、你听见我们的呼唤吗？先生！